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各族群众要像胡杨一样

根连根、心连心

□ 蒲长春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党支部书记沙吾尔·芒力克和全体村民的回信中说：“得知在村党支部带领下，近年来村里又有了不少新变化，各族群众像沙漠里的胡杨一样根连着根、心连着心，日子越过越好，我为你们高兴。”

胡杨是最古老的珍奇树种之一，具有很强的抗干旱、御风沙、耐盐碱能力，维吾尔语称“托克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享有“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的“英雄之树”美誉。习近平总书记用“胡杨”比喻各族群众的亲密关系，生动形象地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坚韧不拔、血脉相连、爱国奉献的特质。

胡杨大多生长于大漠，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但凭其发达的根系，向沙土深处延伸，循水而生，以顽强的生命力屹立于戈壁。就像胡杨一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也在于中华各族儿女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展现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顽强意志

和蓬勃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

在荒漠条件下，胡杨既有有限的种子繁殖形式，种子随风飘落，伺机而生，也有普遍的根蘖繁殖形式，一棵胡杨周围，可根蘖繁殖出数十株甚至更多的后代，从而构成胡杨林形态。这些胡杨共生共存，根根相连、经脉相通，手牵着手、肩并着肩，筑起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它们一样团结一致、血脉相连。中华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胡杨扎根大漠，甘于忍耐、乐于奉献，被人们誉为“沙漠的脊梁”。它们形态各异，有的高大挺拔，郁郁葱葱，闪耀着生命的光芒，也有的瘦骨嶙峋，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但都终其一生竭尽全力维护着胡杨家族，护卫着绿色生态。中华民族同胡杨一样薪火相传、几千年凝聚不散，同各族儿女各尽所能、拼搏奉献、追求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在中国历史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历史佳话，都是各族儿女爱国主义的生动诠释。在近代中国的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爱国主义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就是要发扬胡杨精神，让各族群众心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各自的智慧与力量。

中国和西方只有达成更深的理解，双方关系才能处理好，世界也才能变得更好。正是怀着这种责任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耗时十年，撰写了一部聚焦1978年后中国转型问题的著作——《邓小平时代》，旨在促使西方民众尽可能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发展。2011年，该书英文版在美国甫一问世，便受到广泛关注。2013年，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本书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

由于邓小平及其所推进事业的世界性影响，许多外国政要和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邓小平的经历、思想等进行过深入研究。《邓小平时代》基于扎实的中外文獻资料，充分运用采访邓小平家人、同事和多国政要等300多名受访者的口述史料，对邓小平一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全景式描述。在傅高义看来，“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文革”结束时，中国面临着经济和民生的困局。傅高义在书中描述：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美元；技术水平仍然停留在1950年代；大量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农村，城市无法为他们提供就业。人们当时都在思考，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党和国家该何去何从？

傅高义认为，当时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旧体制到

解放思想是个重大政治问题

——读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 牛先鋒

重读經典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篇重要文献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的最根本问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仅对推动拨乱反正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长期的营养，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变化的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对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

解放思想，直接关系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人们的思想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与社会存在关系的最基本原理。客观现实是丰富多彩、发展变化的，人的思想若是静止于某种状态，即使这种思想一时一地是正确的，随着时空的变化和事物的发展，也会因对象的变化而失去针对性，从而失去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原理就是正确的，对它的运用也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条件而改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本身也包含着解放思想的理论精髓。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今天，也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青春活力。

解放思想，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好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两者是有机的统一，实事求是本身就是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就很

难把事实弄清楚，更不可能探寻到事物发展规律。解放思想本身也要求实事求是，如果不从事实出发，不遵从事物发展的规律，要么会陷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么会出现盲目蛮干。在解放思想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这样才能把党的思想路线落到实处，才能打开事业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思想解放了，人们才敢于思考、敢于探索、敢于突破、敢于创造。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正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解放思想，我们才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的途径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为破除思想僵化产生的消极影响，邓小平提出了三条解决途径。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对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使人们摆脱了本本主义束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就是要在实践中探索真理、检验真理。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作决策、干事情，在实践中中检验是非曲直，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取得成功。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

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二是发扬民主。思想不解放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发扬不够。邓小平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他还指出，要有计划地大胆下放经济管理权，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要把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激励结合起来，“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只有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才能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现代化建设局面。

三是加强法制建设。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法律不完备，就“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因此，“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要的是有法可依。人民民主权利有了法律的保障，人们就能够放手包袱，敢于解放思想了。法制也包括党规党法。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党法，党章就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全党各级组织、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自觉维护党规党法，履行党规党法，“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吹响新时代解放思想的号角

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吹响了新时代解放思想的嘹亮号角。

解放思想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就“第一个结合”来讲，思想解放了，才能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实际；就“第二个结合”来讲，思想解放了，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深邃的文化内涵，才能参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解放思想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由解放思想拉开序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放思想还是首要的。

解放思想是战胜风险、应对挑战的需要。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如果思想封闭僵化、知识乏善可陈、能力严重不足，“身体进入新时代、思想停在过去时”，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袭来之时，就会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最终葬送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发展局面。

解放思想是打开工作新局面、开创发展新格局的需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变化，如何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把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落实到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党面临着新一轮大考。在大考面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仍然是破解难题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用思想大解放引领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难题，科学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战略，才能打开工作新局面，开创发展新格局。

傅高义特别强调，即便当时具备这些有利条件，但“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具有“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在当时，除了邓小平之外没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因此，傅高义充分肯定关键历史人物的独特作用，他写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成功转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邓小平这个领导者个人塑造的”。

在书中，傅高义把邓小平比喻成“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这与我国社会各界关于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普遍认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改革开放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不可能事先就有一张清晰、现成的蓝图，邓小平如同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在选拔团队、解决难题、制定目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的宏大工程，邓小平如同一位“设计师”先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步走”等概念命题和发展战略。无论是“总经理”还是“总设计师”，都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极其深远。

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

——读〔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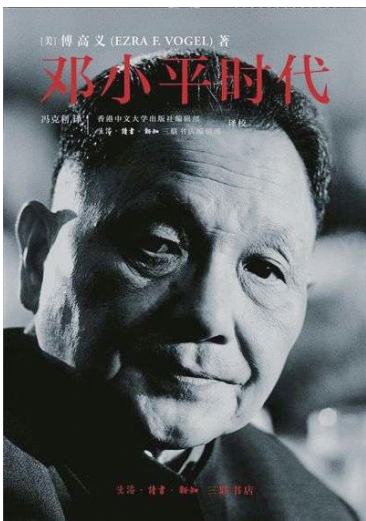
□ 陈 杰

松绑”，并成功推进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化。

“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

傅高义对邓小平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无论是构建“天下秩序”的古代中国，还是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抑或是一度被迫“关闭中西交往大门”的新中国，积极有效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都比较有限，因此都不能算作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大国。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积极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联系，积极学习其他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领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同时，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为了适应新的全球角色，努力进行着各种“接



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

轨”，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傅高义写道：“以经济特区为起点，后来扩大到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的很多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这体现了对外开放局面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邓小平“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并且“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这种程度的开放是在他之前的领导者

没有做到的。傅高义写道：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中国“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

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及其同事找到的“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此途中，中国无论是“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主观与客观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中国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科技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并且，大量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得到平反、重返工作岗位，他们愿意继续“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此外，当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从外国人著作
看中国